

◆“历史上的繁星”系列之一百零六

■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 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建立后,提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全省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和发动民众组织各种抗日武装,准备发展游击战争等四项主要的任务。随着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中共豫东工委、睢县中心县委、永城工委和商丘工委等党组织的重建,商丘抗日救亡运动也日益高涨。作为国共合作形式的抗日救亡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抗战后援会在商丘建立起来,并发展成为抗战初期动员民众进行抗日救亡的一支重要力量。

## 动委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永城工委遵照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指示,于1937年11月29日正式成立了永城动委会,设常委7人,委员20人,主张抗日的国民党永城县长鲁雨亭兼动委会主任,国民党员、县中校长丁振东任副主任,中共永城工委组织委员王更生任秘书,驻会办公,主持日常工作。中共党员刘屏江、王卓然、盛祝堂、陈觉民、陈仪如等均以爱国人士身份参与动委会工作。

动委会成立后,从1938年1月起举办了为期两期抗日青年培训班,培训骨干千余人。培训班第二期招生时发布的布告,可以帮助后人理解培训班的意义。布告这样写:凡我县有志于救国的青年均可报考。考生必须具备积极抗日和拥护国共合作之条件。毕业后分配到各区、乡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正是出于培养抗日救亡骨干的需要,培训班开设的课程很有针对性。培训班开有政治课,讲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讲解抗战形势、抗战国策和群众运动;进行军事训练,传授游击战术;教唱抗战歌曲,排演抗日话剧,并组织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宣传。1938年3月初,时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区长官的李宗仁途经永城时,专门接见了培训班学员,对于培训的方式和成绩十分赞许。

动委会充分发挥培训班学员抗日救亡的骨干作用,于1938年3月上旬,以培训班为基础,组成150多人的5

个工作团,分别由动委会委员、中共党员带队,分赴永城城乡,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根据抗日联庄会章程,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同时,以第五战区的“改革弊政、严惩贪污”的7项禁令为武器,发动群众揭发、审查保长贪污抗日派款的问题,严重者予以改选撤换,或由工作团派人接任。

工作团下乡不足一个月,全县500多个保长被撤换350多人,大大震慑了地方恶势力,但也引起了县城顽固势力的强烈反对。面对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永城动委会在中共永城工委的领导下,在鲁雨亭的支持下,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永城动委会以永城抗日救亡学队的名义向李宗仁请愿。第五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总动委会秘书长刘汉川代表李宗仁接见了请愿团,并对永城动委会和工作团的工作给予肯定和支持。

请愿取得胜利后,永城动委会决定由5个工作团团代行长5个区的区长职权,工作团派人接管各乡政权和联保主任、联保书记及中心小学校长职务,同时建立联庄会和抗日联防自卫队,把原来每个联保一个班的自卫队建制,扩大到30人枪规模。永城广大乡村,由此出现了一派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景象。

## 抗战救援会推动抗日救亡高潮

中共豫东工委成立后,积极争取国民党爱国人士,筹划建立了睢县抗战后援会,主任袁朝庭,中共党员王静敏、谭志政、王鸿钧等参与后援会的领导工作。后援会成立后,于1938年1月10日举办了为期一个星期的抗日青年训练班,100多名爱国青年参加了学习。

中共豫东工委充分利用这个训练班,培养优秀抗日骨干,发展党的力量,先后秘密吸收了10余名先进分子入党。训练班即将结束时,中共豫东工委以后援会的名义,邀请开封光明话剧团到县演出,进一步激发了学员们的抗日热情。学员毕业后,以后援会宣传员的身份,到乡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同时将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农民协会。

中共豫东工委还从学员中抽调21名宣传骨干,组成“中心流动宣传团”,编排救亡节目,以光明话剧团为榜样,到睢县四乡巡回宣传演出。这些演出极大地唤起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一次,宣传团在长岗演出日军残

杀国人的节目,一个爱国青年怒不可遏地登上戏台,大声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同胞们!抗日救亡是当务之急,我们一定要团结奋起,誓死不当亡国奴!”台下的观众闻听此言,立刻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抗日青年训练班的开办和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宣传,引起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不安和恐慌。国民党河南省别动总队勒令解散训练班,停止“中心流动宣传团”的演出。因此,训练班只在睢县办了一期。之后,中共豫东工委以后援会的名义与民权教育局联系,举办了有120多人参加的抗日青年培训班。国民党河南省党部闻讯,又派军委战地工作团六分团的人马赶赴民权,勒令培训班停办。

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尽管受到干扰和破坏,但其影响却在商丘大地上扩散开来,打破了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带来的万马齐喑的局面,唤起了民众的抗日热情,许多热血青年由此奔上抗日前线。

## 民运办事处的抗日武装

在商丘抗战初期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活动中,豫东民运办事处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民运办事处或民运委员会的成立,是在“七七”事变后大批爱国青年流亡到中原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中共河南省委为发挥这些爱国青年的作用,通过国民党一战区政训处民运科,以指导抗日民众运动的名义于1938年年初成立了民运办事处或民运委员会。民运办事处或民运委员会是带有统战性质的组织,具体任务就是在河南各地发动、组织民众,维持战区秩序,支援徐州会战等。

豫东民运办事处在商丘成立后,程潜委任原西北军军官宋克宾为指导专员,40余名热血青年为指导员。这些指导员大多是中共党员和民先队员,他们分别到商丘各县和杞县、鹿邑等周边县,帮助成立县民运委员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豫东民运办事处把抗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像虞城县民运指导员、民先队员葛佩琦等人,了解到时任虞城县的国民党县长和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期放任土匪和一些打着抗日旗号的杂牌队伍横行乡里,而且抗日不力。葛佩琦就向第一战区区长程潜建议,改组了虞城县政府,把主张抗日的县长蔡洪范扶上台,还组建了一支百余人的民众抗日自卫队,打击土匪势力,很快在虞城打开了抗日救亡的局面。还有夏邑民运指导员、中共党员汪洋等人深入乡村、学校,教唱救亡歌曲,演出抗日话剧,发表抗日演讲,广泛发动群众,并在此基础上主持组建了夏邑抗日青年救国团。他还帮助主张抗日的夏邑县长彭建业整训抗日学生队和抗日武装常备队,有力地推动了夏邑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共河南省委及时总结豫东民运办事处的工作经验,给以表彰和推广。1938年4月24日第26期《风雨》周刊就发表社论说:“豫东民运指导员在一个多月中,配合地方青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在宣传方面,办了六期民运周刊,在各县办了壁报,举行了标语运动,普遍教育儿童歌咏,动员学生下乡宣传,召开军民联欢会,举办河防运动……”“在武装方面,他们已组织了三四千人的自卫队,加强了地方武装政治教育,推动了地方封建武力的改造,并注意到农民原始武装如大刀会、红枪会中的工作。”“在民运工作方面,他们推动了各县地方救亡团体的工作,组织了十一个县的歌咏队,六个县的话剧团,并筹备了农民、青年、妇女等救亡团队的成立。”《风雨》周刊号召全省学习豫东民运指导员的工作精神。

豫东民运办事处的工作一直坚持到商丘沦陷。1938年5月下旬,商丘各县大部分沦陷后,豫东民运指导员宋克宾率百余长枪被迫撤出商丘城。6月中旬,宋克宾得知虞城县长蔡洪范和民运指导员葛佩琦组建了虞城民众抗日自卫队,便率部前往会合,成立了豫东民众抗日救国军,宋克宾任司令。之后,宋克宾率部向陇海铁路南转移,途中收编了不少地方抗日武装。部队最后在鹿邑县太清宫一带集结,迅速发展到了2万余人。

(市委党史研究室为采访提供帮助)

### 贵人多忘

“贵人多忘”这则成语的原意是指显贵者待人傲慢,不念旧交,有讽刺意味。现用来讽刺好忘事之人。

典故出自五代南汉王定保《唐摭言》中的《与御史高昌宇书》。王定保(870年—954年),南昌人,唐末光化三年进士及第,丧乱后入湖南,为邕管巡官,弃其妻勿顾,士论不齿,其所终不详,曾任南汉宁远军节度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等职。著有《唐摭言》十五卷(唐南唐何陋亦有唐抚言十五卷,与此同名)传于世。该书详载大量唐代诗人文士的遗闻佚事,多记正史所不详述者。学者李慈铭指出:“唐人登科记等尽佚,仅存此书,故为考科名者所不可少。”(《越缙堂读书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则杂事,亦足以观(chàn,窥视,察看)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唐代贡举制度和士人参加贡举的活动,以及有关遗闻佚事,唐代诗人的零章断句为别集佚载者,也多赖此书保存。

《与御史高昌宇书》的作者王泠然,唐朝

### 连载

## 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

■刘秀森

时的一名进士,由于家境较贫困,无钱疏通关系,一直闲置在家,没能当上一官半职。一次,他想起与御史大夫高昌宇曾经有过很好的交往,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给自己谋个官职。这封信的开头写道:“仆之怪君甚久矣,不忆往日任宋城县尉乎?仆稍善文章,每蒙提奖,勤勤见遇,又以齐氓,叨承恩顾,铭心在骨。复闻升进,不出台省,当为风流可望,故旧不遗。近者伏承皇恩,出使江外,路次于宋,依然旧游,门生故人,动有十辈,蒙问及者众矣,未尝言冷然。明公纵欲雄心不垂半面,岂不畏天下窥公侯之浅深?”

“宋城”即商丘,唐朝时,武德四年商丘又改为宋州,天宝元年置睢阳郡,属河南道(唐太宗时分全国为十道),乾元元年复为宋州,商丘城被称为宋城,为宋州州治。《与御史高

昌宇书》中的这段话的意思是:我怪你的时间长了。还记得你当年在宋城当县尉时的情景吗?那时我的文章已经写得不错,你时常夸奖我,也时常指点我,对此,我一直铭记在心。后来你高升了,到朝廷去做官了。我本以为你会时常记起我这个老朋友,不料你出使江南路过宋城时,问候了很多人,却没有一句话提到我。你升了官眼珠向上翻,不愿再问我这样低贱的人了……

接着,王泠然又写到高昌宇与自己有关的一件事:“有一年你担任高主考,我是考生,我以为这下该取了,不料你就是让我落选。尽管你当年没取我,可今年还是中了进士。”信快结束了,王泠然表露了他的要求:“你给予的好处我牢记,你给予的耻辱我也没有忘记。我希望你给我一点恩惠,用来清洗你让

我蒙受过的耻辱,望你高抬贵手,今年帮助我娶个媳妇,明年为我谋个官职。对你来说,这些都是区区小事,完全可办得到。你的恩情我会牢记在心的。”结尾,王泠然用不冷不热的语写道:“儗也贵人多忘,国土难期,使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仆生长草野,语诚触忤,并诗若干首,别来三日,莫作旧眼相看。山东布衣,不识忌讳,冷然顿首。”意思是:倘若你因为做了高官成了贵人而把老朋友都给忘了,那么你应该知道,文人的前途是无法预料的,不知哪一天我也当了高官,与你平起平坐,我也傲气十足,对你也侧眼相视。那时你即使懊悔地向我道歉,我还会有好的脸色对你吗?下面是署名。

“贵人多忘”这一成语,在商丘方言中又称“贵人多忘事”,便来源于王泠然这封信中“儗也贵人多忘”这句话。

例句:“我怎敢恰为官贵人多忘。”(元代官大用《范张鸡黍》第四折)另外,商丘人若遇到有原来认识他的人后来再见面却不认识了,便讥刺说:“你贵人多忘事,怎么能还认得我呢?”(6)

